

幕末日本的“类宋”感怀与苏轼受容

——以《东坡策》为中心

黄小珠

内容提要 以“黑船来航”为标志的海防威胁，以及德川幕府积习已久的重重内患，在幕末日本催生出一股“类宋”感怀思潮。围绕《东坡策》而展开的书籍文化活动是“类宋”史观的产物，它承载着幕末日人借苏轼进策干预时政的现实诉求。作为古文的《东坡策》具有双重属性，一方面它呼应社会变革，另一方面它又是“文章学”的典范，从而造成评点上重“史眼”与重“文心”的不同取向；它激励着幕末日人在海防问题上的士气与文风，在结构、立意、遣词造句等方面影响《海防备论》的军事思想与写作方式；它彰显出中国传统古文曾以不同的面相影响日本的近代化进程，富有启示性。

关键词 幕末日本；“类宋”；《东坡策》；苏轼；受容

日本嘉永六年（1853年）六月（本文所用月日，均为阴历），美国佩里舰队发动“黑船来航”事件。自此，德川幕府结束二百余年的闭关锁国政策，被迫陆续与美、英、俄、荷诸国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同期的中国在经历鸦片战争之后，一步步丧失主权，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一般认为，从此期开始，日本渐次走上一条由“脱儒”进而“脱亚”的道路^[1]。然而，在幕末日本近代化的探索进程中，儒学并未完全受到摒弃。同时，日人通过中国形象进行自我审视亦不局限于在鸦片战争中败北而沦为反面教材的清王朝^[2]。实际上，在幕末日本还存在着一种“类宋”史观，即他们发现当时国家情势与宋朝类似，并希冀从二者的类比中寻求一条解决国家危难的道路。“类宋”史观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幕末知识人群体的时局观与文化心态的多元面相，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去考察宋代文学与文化在当时的受容情况，进而可深入了解宋学的特征及其近代演化等问题。不过，有关日本近代文化史的相关研究多强调西学影响层面，“类宋”史观也逐渐湮没在“脱亚入欧”论的历史浪潮之中，迄今为止，学界还未有以之为主题的相关研究。

作为宋朝富有代表性的文人官僚，苏轼及其文学作品很早就传入日本，并形成一股源远流长的苏轼受容史。虽然学界对日本苏轼受容研究已积累不少成果，但是，就幕末时期情况而言，目前这方面的研究还缺乏富有时代特征的观照，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也未得到应有的整理与利用。典型的例子就是成书于幕末的《东坡策》。此书问世后不断地被翻刻、钞写、点校、评点，许多文化名人之为题序、题跋，并将之运用于具体的政治实践之中，形成一股不可小视的受容热潮。然而，在日本苏轼受容史的相关研究中，如《日本苏轼研究述略》对此书及其文化现象只字未提^[3]。据笔者管见，目前仅有一篇与本课题相关的研究成果，即唐利国《日本近世汉学与幕末变革思想——以吉田松荫〈东坡策批评〉为中心》^[4]。唐文以《东坡策批评》为中心，探讨幕末变革家吉田松荫的变革思想，富有启示性，但此文未对《东坡策》的成书始末、流传情况及评点特征进行系统考察，且唐氏将苏轼思想当作汉学笼统对待^[5]，与本文采用的“类宋”视域有所不同。

有鉴于此，笔者将以“类宋”史观为着眼点，以《东坡策》为中心，考察其成书原委、版本情

况，并结合序跋、评点及相关史料，探析此期苏轼受容的时代特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苏轼策文对《海防备论》的影响，力图在历史与文本之间，探讨以苏轼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古文在日本近代化转型中的意义，并祈教正于方家。

一 《东坡策》的成书与“类宋”感怀

北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苏轼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制科考试^[6]。在此之前，他曾上呈五十篇进卷（策、论各二十五篇），以供录取之参考^[7]。二十五篇进策分策略（五篇）、策别（十七篇）、策断（三篇）三类，是一组“系统地阐述苏轼的治国之策的政论文”^[8]。在当时，这组策文以进卷的形式流行于朝廷和士子之间，随后，它们或被选入各类苏轼文集之中，成为苏文的一部分为人所知；或被收入各类古文选本中，成为供人传诵不息的文章经典。总之，在中国，从宋迄今，这组策文一直作为苏轼古文的一部分流传于世，未有单行本问世。

日本幕末学人藤森大雅（1799—1862年）首次将此二十五篇进策编为一书刊行，名为《东坡策》。藤森大雅，字淳风、通称恭助、天山，号弘庵、如不及斋，是幕末著名的勤皇“志士”。其生平或为藩主宾僚，或自设讲台，标榜“实用学”，因尊皇攘夷，1858年被陷“安政大狱”，文久二年（1862年）获赦，出狱后旋即离世^[9]。藤森曾于佩里来航次月著《海防备论》（又称《海防秘论》），系统探讨如何抵御美国的海防威胁。

自藤森氏《东坡策》刊行后，此书就被多方覆刻、钞写、点校、评议。结合日本“汉籍数据库（汉籍データベース）”^[10]的检索结果以及题序、题跋、人物传记等史料可知，此书在幕末出现多种不同版本，笔者寓目了以下具有代表性的五种重要版本：

序号	书名	刊、写时间	编评者、点校者	序跋作者
1	东坡策（进修堂刊本）	江户末期	藤森大雅编	无序
2	东坡策（和泉屋刊本）	江户末期	藤森大雅编	无序

序号	书名	刊、写时间	编评者、点校者	序跋作者
3	东坡策（刊本）	天保八年（1837年）	藤森大雅编	林鹤梁序
4	东坡策批评（写本）	安政六年（1859年）	吉田松荫评点	林鹤梁序、吉田松荫跋
5	东坡策辑评（刊本）（又名《东坡策》）	明治三年（1870年）	藤森大雅编评、林钧点校	林鹤梁序、林钧跋

这些版本皆分上中下三册，每册一卷，共三卷。其中可最早系年的是天保八年（1837年）木活字刊本。此本冠有藤森友人林鹤梁（1806—1878年）之序。林鹤梁又名长孺，是幕末日本著名的汉学家。此外还有进修堂刊本、和泉屋金右卫门刊本，此二本皆无序。有序本与无序本，孰先孰后，难以遽断，或先有无序本，后有有序本。此外还有两种评点本，即藤森大雅《东坡策辑评》和吉田松荫《东坡策批评》。藤森评点本虽刊行于明治三年（1870年），实则嘉永年间，此书已在其生徒中流传开来。藤森学生林钧跋语云：“右《东坡策辑评》，嘉永中弘庵藤森先生所考订以授生徒也。余尝受读之，久藏于家。顷者书贾吉兵请刻公于世，乃出附之。”^[11]《东坡策批评》是幕末重要的思想家、教育家、明治维新的精神领袖和理论奠基者吉田松荫（1830—1859）临终前的手批本。和藤森大雅一样，吉田松荫也作为尊皇攘夷“志士”被陷安政大狱，此书乃其狱中所作。吉田松荫死后，此手批本被保存在山口县萩市松荫神社，明治三十二年（1899年）松荫后人吉田库三（1867—1922年）将此书点校排印，东宫侍讲三岛毅（1830—1919年）为之作序（此本后被收录在山口县教育会编纂的《吉田松荫全集》中）。除了这些刊评本之外，《东坡策》在幕末还被多方钞写，如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宫城县立图书馆、文教大学附属图书馆分别藏有三种不同的手钞本。

《东坡策》在幕末日本的出现及出版热潮，绝非偶然。它反映出在此激荡变化的历史时期，日人对苏轼策文自觉、主动的接受与运用。笔者认为，促成这一历史关合的一个重要机缘，是当时流行于日本知识人群体中的“类宋”感怀。以下，略举诸

版《东坡策》序、跋之语加以分析。

首先,来看天保八年之序:

幕府聪明英武,能诩王室,以致驩虞之治。而其威武之重,卓越前古,非复弱宋之可比也。虽然法久而弊生,治久而俗奢,理势之当然也。今虽极盛之世,岂无一事之可忧者哉?而世儒有轻俊机警之辩,而无雄健英豪之才。徒谈空理于纸上,而遗实用于讲学。时务之策,盖阙如矣。此淳风之所以有此举也。抑夫读者若谓苏公之所慨在当时,不在后世,则淳风此举亦何益?而苏公之志荒矣,故苟能效苏公之策,从事于经济实用之学,异日或有以供国家之用,则举而措诸天下不难也,淳风此举亦果有益矣。^[12]

尽管林鹤梁说“(幕府)非复弱宋之可比”,但如果将此序所述幕末情况与苏轼《策略一》所状北宋情势加以对读的话,即可见二者的相似性。苏轼云“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有可忧之势,而无可忧之形,此其有未测者也”,这与林鹤梁看到的“法久而弊生,治久而俗奢”的幕府形势何其相似。

如果说,在“黑船来航”之前,日人对幕府与宋朝之关联的看法,还只是无意识的类比,那么,“黑船来航”之后,外围势力的直接威胁,则让他们直观地感受到幕府与宋朝之间跨越历史的相似性。试看林铨之跋语:

右《东坡策辑评》,嘉永中弘庵藤森先生所考订以授生徒也……因思当时洋夷猖獗,偏乞互市,而海内艾安,上下解弛。官谋其不可骤拒,权有交通之议,人心恟恟。其势虽非赵宋孱弱之比,颇相类者盖亦不少。宜先生之取以授生徒也。^[13]

佩里扣关的一个重要目的是逼迫日本开港通商,此举曾在江户引起恐慌。面对“洋夷”的威胁,幕府上下,或战或和,莫衷一是。此一形势,颇类宋朝与辽、西夏之关系。不难想象,在幕末士人中存在着这样的认识:日本与“洋夷”之关系,诚如北宋与西北二虏,二者处于一种不平等的地位之中。

到了安政时期,随着日本国内外局势日益严峻,“类宋”史观的表达也更加鲜明。吉田松荫曰:

“呜呼,吾二百年来,国势颇类赵氏,而近日虏患,又不在辽、夏之下,且吾公之仁贤,盖亦宋仁之流也。是以此策之所言,往往中此间利弊矣。”^[14]而到了明治初期,日本人回顾这段历史时,对此则有一种盖棺定论的总结,三岛毅《松荫评东坡策小引》曰:“盖谓当时国势衰弱似赵宋,外国猖獗似辽夏,是借《东坡策》以为己策也。”^[15]

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认为,在十九世纪初至60年代,西方势力东渐后,近代日本的民族观念才渐渐形成。“在此期间,从幕府官邸、大名城堡以至各个私人学塾中,关怀时势的武士希望从历史及时政的辩论中找出对策。”^[16]据此可见,“类宋”史观可谓是幕末日人的一种自我发现,他们在内忧外患之际,希望从宋朝经验中寻找一条解决国家危难的道路。从这个意义来看,《东坡策》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了日本近代民族国家观念的建构,是这一时势之下应运而生的产物。

二 “史眼”与“文心”:《东坡策》评点的现世关怀与古典传统

《东坡策》因“类宋”而生,它承载着幕末日人借苏轼进策干预时政的现实诉求,那么面对具体的文本信息,时人又如何将这一时代感怀融入其中?本节将通过对比吉田松荫《东坡策批评》和藤森大雅《东坡策辑评》两种评点文本,探讨评点者的现世关怀及其与古典传统之间的复杂关系。

(一)以《东坡策》为己策:吉田松荫的“类宋”评点与警世用意

正如三岛毅的总结,这是一部“借《东坡策》以为己策”的著作。吉田松荫《东坡策批评》以传统的评点方式,将当时流行的“类宋”感怀落实在具体文本批评之中,他往往借宋朝时势毫不留情地指斥幕府时弊,在此基础上,提出解决现实问题的变革方案。如《策略一》,苏轼认为“天下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进而希望君主“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松荫批注曰:“当今天下之势正如此,而吾藩最似焉。此策,余常欲献诸吾公,而未有路也。”苏轼认为君主应当奋发有为,松荫亦希望能够向藩主进献《东坡策》,以期推动社会变革。

又如《策略二》中，面对辽、西夏的侵犯，苏轼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进而对“吾君吾相，终日惶惶焉”加以批评。吉田松荫批注曰“今日幕府之事然”、“幕事亦然”。此类“幕事亦然”的言论在全书中比比皆是：如《策略三》评点曰“易人尤法今亦然”，《策略四》评点曰“今日之事，不亦然乎”，《策别·厚货财二》评点曰“当今之兵制，全似宋代而其弊更甚，是国家之大艰也”，《策别·训兵旅三》评点曰“今世之事，着着皆然”，等等。上揭唐利国文认为，《东坡策批评》体现出吉田松荫的变革思想包括“君主中心的政治观”“人才中心的制度论”“以攻代守的国防论”。可以发现，这些思想基本源自苏轼进策的政治主张^[17]。总之，在幕府与宋朝相类的历史审视之下，苏轼向宋廷进献的策略主张，也顺理成章地成为松荫变革思想的重要资源，由此形成在对照中提出变革主张的评点路数。

基于变革现实的强烈意图，松荫极力渴望《东坡策》能够获得当政者及世人的赏识，其评点也由此带上强烈的警世用意。教导读者如何会通文意的“读书法”可谓这一用意的集中体现。在手批本封面的背面有一段松荫自题文，曰：“读文字，宜先认篇中要领及着落处，又认段落节断，故余随读、随批，又随段之，虽有一二差错，或足发初学之眼目欤。”^[18]松荫认为读文字要先抓段落大意，不拘泥于一二差错，以引导读者把握作品思想为要务。在今天看来，这一读书法并非稀见，然而若置之于以严谨著称的日本汉文学传统中，便可发现这是相当大胆的。究其缘由，大概由于松荫当时身陷囹圄、生死未卜，为让世人真正地理解《东坡策》的价值，故强调抓主脑、不拘小节的读书法。除这段总论之外，吉田松荫还进一步将此“读书法”贯彻到具体篇章评点中，如《策略一》批注云“是等处，在本篇为客，然读书者，宜件件低回，是知事务者之为”“他日每读宋仁宗时书，念念对照，验此言之浮沉，是读书法也”，《策略五》批注云“五事一一着实，于今尤切，吾原不知坡公，读至此，不觉心折，故常欲人读此策也”，等等。此类评点都是在和潜在的读者进行对话，具有导读功能，目的是为引导、提醒读者去把握作品的思想意涵。除

此之外，在松荫评点中，还对其他文人不同阅读取向提出严厉批评，如《策略五》批注曰：“孙月峰选东坡文，特削此一段（按：指苏轼文中所谈君臣之事），妄人不足与言文字，何况经济有用之学。”吉田松荫指斥孙月峰为妄人，不仅在于孙氏擅删苏文，更在于其所删者乃“经济有用之学”。

由上可见，松荫的评点呈现出历史省察与读者诉求之间矛盾张力，一方面他迫切地将自己的历史观察倾诉给读者，另一方面他又担心读者不能尽得其意，在评点过程中苦口婆心地教导他们如何“读书”。缘是之故，吉田松荫经常打断平静的评点，他积极地通过与读者对话的方式，力图影响、改变、塑造读者的阅读取向，从而发挥出《东坡策》的时代价值。总之，吉田松荫借《东坡策》以干预现实政治之际，也为我们呈现出一个迫切改革、苦心积虑、患得患失的自我形象。

（二）唐宋派的谱系：藤森大雅的文法论

尽管时政关怀是《东坡策》编评活动的应有之义，但在具体文本评点上，不同阐释者往往根据自身处境以及知识结构做出不同解读。与吉田松荫专注现实的评点取向不同，藤森大雅虽然出于“供国家之用”的目的而编评《东坡策》，但他很少对策文涉及的时政事件展开评论，而几乎将所有的关注点都投置于文章写作技巧上，呈现出“重文法”的倾向。这首先体现在，藤森的评点大量引用中国传统古文辞家的观点。请看下面的考证统计表：

藤森大雅《东坡策辑评》评点情况

评点情况	评点者	文献来源	评点条数	所占百分比
引用 评点	楼迂斋	《崇古文诀》	4	2.285%
	唐荆川	《唐宋八大家文钞》	10	49.14%
	茅鹿门	同上	76	
	吕雅山	不详	1	0.571%
直接 评点	藤森大雅		84	49.00%
总 计			175	100%

表中的“引用评点”指藤森以“某某曰”的方式引用他者的评点，“直接评点”则是他本人直接

对此书的点评。据此表可见，藤森所引唐顺之（号荆川）、茅坤（号鹿门）两人的评语总数在全书中比率最大。唐、茅之语皆出自茅坤编选的《苏文忠公文钞》。《文钞》是一部集中体现明代唐宋派文学理论，并给学习古文者提供范例的文章总集。茅坤在文道合一的理论格局下，通过评点对古文的作法和技巧进行了具体分析，形成了重开阖抑扬、进退离合、经纬错综的文章“法度论”^[19]。作为一部教授生徒的古文教科书，藤森所引《文钞》评语多与文法相关，如总说结构布局之法，引“茅鹿门曰：‘此以人主自断为策，《略》之始下四篇指其事而条之’”（《策略一》）；言段落起伏之法，引“唐荆川曰：‘此篇前后各自为断落，起伏与《决壅蔽》篇同’”（《策略四》），等等。此书所引南宋楼昉（号迂斋）评点皆出自《崇古文诀》，这是一部注重“文法示范性”与“文本的文学性”的古文选本^[20]。如《策别·训兵旅·倡勇敢》，藤森引“楼迂斋曰：‘此篇主意通上下之情，间架整、波澜阔、议论佳，可为策格。’”吕雅山应为明人吕炯^[21]，其评点路数与唐宋派相似，注重分析作品的文法辞令，如《策别·安万民·教战守》中，藤森引“吕雅山曰：‘此篇文字绝高，辞意之玲珑，神体之融液，势态之踔跄，各臻其妙。’”

藤森本人的直接评点基本是在效法茅坤等人的基础上，对文章技法作更为详尽的推衍说明。如茅坤于《策别·安万民·敦教化》栏间注“浅”“深”二字，藤森将此进一步发挥曰：“此一段与上‘三代之民’一段之意相次，特有浅、深之分耳。”藤森还特别重视通过总括大意的方式剖析文章的“开阖首尾”，使读者对文章结构布局一目了然，如《策略二》曰：“文字凡三段，第一段言成天下之治者在于去二虏之忧，第二段言欲去二虏之忧者在于清中书之务，第三段言欲清中书之务者在于设行人属国之官，然文脉自相通，断而不断。”此外，藤森常用的“略说正意”“明说正意”“掉尾应首”“掉尾甚活”“双提分应”“造语互见”等批语，均沿袭茅坤等人的话语系统，着眼于从章法、句法、字法等方面引导读者去理解古文的法度之妙。总之，藤森虽然把《东坡策》当作是一部治国理政之书，但他的评点仍延续传统古文辞派的范式，可

将之视为明代唐宋派的谱系。

（三）差异的背后

由上述可见，吉田松荫和藤森大雅的评点呈现出“史眼”与“文心”的差异，即重视历史借鉴与重视文法技巧的不同取向。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复杂多面的。从表面来看，这大概由于评点者所处境遇不同，如藤森大雅的评点发生在嘉永年间，当时虽有“洋夷逼乞互市”之患，但于他个人而言，还未有直接威胁，而吉田松荫的评点则发生在他被捕入狱、随时都有性命之忧之时。二者不同的处境，或许直接导致他们的评点之间存在着因循传统与突破创新的差异。然而，结合苏轼进策在中国的“历史遭遇”可以发现，藤森大雅因循的传统不过是后人的一种建构，而吉田松荫的突破或许才复原苏策的本相。

在嘉祐六年的贤良制科考试中，苏轼凭借这二十五篇进策（另有二十五篇进论）获得优异成绩，以此顺利进入仕途。然而他后来却多次否定这批策文，晚年自编《东坡集》对这些文章弃而不用。究其原因，这与苏轼政治主张的变化与特殊人生遭遇有关。在变革风气颇浓的仁宗朝，苏轼著策提出革新主张符合大势所需，然而当他目睹王安石变法带来的弊端之后，则进一步反思自己这些想法。身陷新旧党争中的苏轼，因此被政敌诋毁为“言论不一”。出于畏祸避难心理，他在自编文集时摒弃这些作品。由于苏轼文名显著，这些被他弃用的进策在南宋被编入《应诏集》中，随后也被编入各种苏轼文集中^[22]。此外，这组进策还大受后代古文选本青睐，如吕祖谦《古文关键》、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沈德潜《唐宋八大家文读本》、储欣《唐宋八大家文类选》等，或部分或全部收录这批策文。值得注意的是，包括《应诏集》在内的这些古文选本，大多因士人举业而流行于世，文章法度技巧成为关注重点。正如乾隆《御选唐宋文醇》所云：“轼、辙皆有应制举拟策，乃场屋之文耳，虽烂然可观，而非古之所谓立言者也。自宋孝宗推崇之后，学者用以取金紫，翕然从风。当时鄙谚，谓‘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良足嗤也。”^[23]可以这么说，从宋至清，中国文坛主要着眼于文法技巧的视角关注这批策文，而有意或无意

地忽略其中蕴含的为政主张。

由此反观藤森大雅的评点，不难理解其“求实学”与“重文法”的悖谬——虽然藤森氏有意识地编评《东坡策》以图“国家经济之用”，但是受到中国文学批评传统的影响，他的评点未能摆脱唐宋派重文法的藩篱。如果说藤森氏的评点仍不可避免传统古文习尚的影响，那么吉田松荫则复活了这批古文作为治国之策的政论品格。他曾以“史眼文力”来评论《东坡策》^[24]。“文力”自不待言，指苏轼刚劲有力的文风，“史眼”则指苏轼善于通过以古鉴今的方式来观察社会问题、提出改革方案。在松荫看来，苏轼的“史眼”不仅照见了宋朝时弊，也照见了幕末日本的重重困境，为其政治变革指明方向。

三 《东坡策》对《海防备论》的影响

《东坡策》对幕末日本的影响，不仅体现在以之为媒介的各种书籍文化活动之中，它还直接影响当时知识群体对海防问题的讨论与写作，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振奋士风、文风的意义，正如林钧所言：“右《东坡策辑评》……议时务、策海防，而草茅危言之徒亦相继并起，慷慨感愤，以张正气于一时。”^[25]本节以藤森大雅所著《海防备论》为例，结合时政局势和文本对读，论述《东坡策》对幕末日本海防策论文写作的具体影响。

嘉永六年（1853年）六月三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马修·佩里率领四艘舰艇侵入浦贺水域，以武力要挟幕府接受美利坚合众国大总统的国书。面对佩里舰队带来的威胁，幕府向诸大名、武士咨询对策，随后任命水户藩的德川齐昭（1800—1860年）担任“海防参与”一职。藤森大雅《海防备论》作于嘉永六年七月，是佩里来航之后最早一部系统讨论海防事务的文章^[26]。通过文本对读可发现，《海防备论》从结构、立论到写作用语等方面深受《东坡策》影响，具体内容如下：

第一，在全书结构布置上的影响。如上所述，《东坡策》三卷，分“策略”“策别”“策断”三类。“策略”专论总体国势，“策别”则分别对民生、财政、任吏、边防四大危患开列救治措施，“策断”

对当时最棘手的如何对“二虏”作战的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每类目之下又分设若干子课题，如策别之中分“课百官”“安万民”“厚货财”“训兵旅”四个层面，每层面又各包含数个篇目。与此相应，《海防备论》全书分“总论”“处置之宜论”“当务之急论”三类，各类之下又细设具体论题，分别是：

总论之一：定国是以明志。总论之二：立总督以定庙堂。总论之三：立全体之结构。总论之四：设置遍及海内之防御。

处置之宜论一：省费用，通财源。处置之宜论二：广储蓄以备不虑。处置之宜论三：育人材以备不虞。处置之宜论四：制利器，盛人胆。处置之宜论五：设文武合并之大学。

当务之急论一：回信之方（按：此条为模拟回复美国所致国书）。当务之急论二：论战略。^[27]

藤森大雅跋文云：“总论四篇以立天下大势，其次着手论处置之宜五篇，仔细玩味，可得天下海防术策之大半。其后论当务之急以应危急。据此，可勉天下大祸，使事安。”^[28]大体而言，“总论”对应《东坡策》的“策略”，“处置之宜论”对应“策别”，“当务之急论”对应“策断”。据此可推测，藤森在结撰全书时，有意借鉴其编纂的《东坡策》的立论思路。

第二，在军事战略上的影响。藤森《总论之一：定国是以明志》开章明义，标明拒绝与美国通商之志。在明志之上，如何防御美军的海防威胁？面对这一难题，藤森提出的战略主张有不少继承苏轼思想的成分。如《总论之二：立总督以定庙堂》，藤森认为“庙堂是天下万事之根本，庙堂镇静足以定天下之动”^[29]，故立总督使之专权海防事宜，可使庙堂定而功成。这一思想明显受到苏轼《策略二》的影响。苏轼云“中书者，王政之所由出……非至静无以制天下之动”，故认为面对边患，不需整个朝廷为之忧患，主张专任大员即可。在《总论之四》中，藤森认为与美国一战在所不惜，故须设置遍及海内的防御措施，并号召幕府的大诸侯、小诸侯以及旗下武士皆要演习“军役”或“水战火术”。此一战略思想与苏轼《策别·安

万民·教战守》有许多相合之处。苏轼认为与西北之虏“必至于战”，故主张在士人之中开展多方位的防御准备——“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讲习兵法；庶人之在官者，教以行阵之节，役民之司道者，授以击刺之术。”此外，全书着墨最多的“处置之宜论”也有不少借鉴《策别》中的战略思想。大致而言，《处置之宜论一：省费用、通财源》对应《策别·厚货财·省费用》，《处置之宜论三：育人材以备论》对应《策别·训兵旅·蓄材用》，《处置之宜论四：盛人胆》对应《策别·训兵旅·倡勇敢》，分别论述了开源节流、保障军费，培育军事人才以及砥砺士兵作战胆力的重要性。

第三，在遣词造句上的影响。尽管《海防备论》以日文写成，但在语言表达方面受《东坡策》影响依然有迹可循。如小标题“費用を省き”（《处置之宜论一》）与“人材を育て、用に備ふる”（《处置之宜论三》）明显是苏轼“省费用”“蓄材用”的翻译语。这类挪用苏轼原话的做法在具体行文论述中也时时可见：如苏轼《策略一》以西汉为例，批评当时“溺于晏安”之情势，藤森《总论之一》亦以“人情の晏安に溺る”分析当时国势；又如苏轼《蓄材用》云“设武举、购方略”，藤森《处置之宜论三》亦云“材武を賞し給へ”“方略の士求め玉へ”等等，后者明显有模仿、化用前者的痕迹。

当然，站在近代的关节点上，藤森的海防思想体系中不乏一些近现代军事思想的质素，如《处置之宜论四》，藤森虽然站在保守主义的立场认为“学习西洋队伍、西洋操练有损皇国美风”，但是他仍主张学习西方“大舰、大铳”等利器的制造方法，《处置之宜论五》则主张设立文武合并之大学。尽管如此，《海防备论》受苏轼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甚至可以说，藤森关于海防战略的主体思想和写作方式直接来源于其亲手编纂的《东坡策》。

余论

中国文学传统中的古文往往秉持双重特性：一方面它联系着政治与社会变革，如中唐韩柳倡导的“古文运动”就与“政治上的改革活动与革新思潮相呼应”^[30]，北宋欧苏的“古文革新运动”也

应乎当时改革政治的期望^[31]；另一方面它又是科举制文的典范，影响、规范后人的古文观念与创作。《东坡策》所收的二十五篇进策从它诞生之日起，就兼具这双重面目——它既是苏轼应“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的制科文，也是作者深刻阐述治国之策的政论文。不过，由于个人及历史原因，在后代，这批策文作为举文典范的一面不断被强化，而其解决时政问题的思想火花则或有意或无意地为人们所淡漠。幕末日本，内忧外患、风起云涌。在中下层知识群体中兴起的“类宋”感怀，使他们将目光投向宋朝，并期望从中寻求政治经验，以纾国难。《东坡策》正是这一时代思潮的产物，它重拾起苏轼进策的政论品格，并赋予它新的时代意义（当然，此过程仍不免“制科文”的影响，如藤森大雅重文法的评点倾向）。一言以蔽之，上述内容可总结为：作为古文的苏轼进策以《东坡策》的方式在异域（日本）的复活与运用。

就像苏轼常常被当作保守的变革者，幕末日本受《东坡策》影响的这些攘夷志士也往往站在“开国者”的对立面而为人所知。但是，保守并不一定意味着走向历史的反面。正如美国日本史研究专家马里乌斯·詹森（Marius Jansen）所言，“（幕末时期）主张拒绝美国人要求的并非对西方力量毫无认识的反开化论者……拒绝会带来危险并可能使日本战败，然而日本正需要这种同仇敌忾来提振日本人的精神”，而这种精神与儒家学说的影响有莫大的关系^[32]。可以说，《东坡策》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境遇中，内化为幕末日本人护国攘夷的精神资源。事实上，它也在实际的政治决策方面发挥过作用。上野日出刀分析《海防备论》认为：“弘庵的最重要意图在《总论二》，即立总督以定庙堂之事。要而言之，他期待起用水户的齐昭为总督。”^[33]据此可推测，《海防备论》对德川齐昭任“海防参与”一职曾起到一定的舆论助推作用（在此之后，藤森大雅以准家臣的身份进入水户家）。如上所述，这一思想实则源于苏轼《策略二》专任大员的军事主张。

虽然目前对幕末日本文学史、思想史的关注重点多在西学影响的层面，但在这一时期，传统的汉学仍发挥着强劲的生命力，尤其是宋人的学术思想与文学文化对幕末日本人的历史观念、政治选

择以及文学创作皆有不可低估的影响。不难想象,在激荡变化的幕末时期,以《东坡策》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古文曾以不同的面相影响着日本近代化进程,而对于这一过程全面而深入的考察,或许是今后研究不可忽视的重要课题。

[本文系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一般课题“北宋‘文人经学’与文学研究”(项目编号2019BWY0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1] 参见韩东育:《从“脱儒”到“脱亚”——日本近世以来去“中心化”之思想过程》第六章《两种“实学”的相遇与幕末明治期的“脱亚”行程》,国立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12年版。

[2] 小岛晋治「日本人の中国観の変化——幕末維新期を中心に」提出,在“鸦片战争”之前,日本有识者大多认为清朝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强国,清朝在“鸦片战争”中败北之后,在日人眼中,中国沦为幻灭与轻侮的对象。此文出自神奈川大学人文学研究所编『日中文化論集:神奈川大学・浙江大学学术交流十周年紀念:多様な角度からのアプローチ』(勁草書房2002年版)。

[3] 参见曾枣庄主编:《苏轼研究史》第十章,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

[4] 唐利国:《日本近世汉学与幕末变革思想——以吉田松荫的〈东坡策批评〉为中心》,《史学集刊》2013年第2期。此文亦刊于『駒沢史学』,第85卷,2016年3月。

[5] 唐利国论文所谓“汉学”应泛指中国传统文化,非“汉宋”之“汉”。

[6] 此制科考试全称为“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第一百十一册,《选举》一一之一、之八,中华书局出版1957年版)。考试名称有时也被简称为“贤良方正直言极谏”或“直言极谏”。

[7] 有关北宋制科考试与贤良进卷,参见朱刚《北宋贤良进卷考论》(《中华文史论丛》第93期,2009年3月)。

[8] 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第321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9] 关于藤森大雅生平,参见望月茂『藤森天山』(藤森天山彰显会1936年版),上野日出刀『梁川星巖・藤森弘庵』(明德出版社1998年版)。

[10] <http://kanji.zinbun.kyoto-u.ac.jp>

[11][13][25] 此三条俱见藤森大雅编:『东坡策輯評』

跋语,名山書坊明治三年刊本。

[12] 藤森大雅编:『东坡策』序言,天保八年刊本。

[14][15][18][24] 山口県教育会编:『吉田松陰全集』第八卷(定本版),第369页,第371页,第308页,第367页,岩波書店1934—1936年版。

[16] 安德鲁·戈登(Andrew Gordon):《现代日本史》,李朝津译,第75页,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

[17] 有关苏轼进策的思想内涵,详见王水照、朱刚:《苏轼评传》,第319—335页,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19] 关于唐宋派的文法论,参考罗书华:《“唐宋派”文法论的三个层面》(《船山学刊》,2012年第4期)、夏咸淳:《〈唐宋八大家文钞〉与明代唐宋派》(《天府新论》,2002年第3期)。

[20] 关于楼昉《崇古文诀》的评点特色,参见李建军:《宋人古文选评之典范——〈崇古文诀〉选评特色及价值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3年第1期)。

[21] 参见过庭训:《本朝分省人物考》卷四四,广陵书社2016年版。

[22] 参考江枬:《二苏对其〈策论〉的摒弃及二书的流行》,《学术论坛》2018年第1期。

[23] 爱新觉罗弘历:《御选唐宋文醇》卷五一,武英殿刊版,1738年。

[26] 此书以日语书写。本文讨论的著作,如无特别说明,均为汉语书写。

[27] 藤森大雅:『海防备论』,住田正一编:『日本海防史料丛书』卷一,海防史料刊行会1932年版。此处所引目录内容为笔者拙译。本文涉及此书引文均同。

[28][29] 住田正一编:『日本海防史料叢書』卷一,第168页,第126页。

[30] 孙昌武:《唐代古文运动通论》,第15页,百花文艺出版社1984年版。

[31] 钱冬父:《唐宋古文运动》,第6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

[32] 马里乌斯·詹森(Marius Jansen):《坂本龙马与明治维新》,曾小楚译,第50页,上海三联书店2019年版。

[33] 上野日出刀:『藤森弘庵』(叢書・日本の思想家),第278页,明德出版社1998年版。引文为笔者拙译。

[作者单位: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

责任编辑:李超